



裴帕·拉希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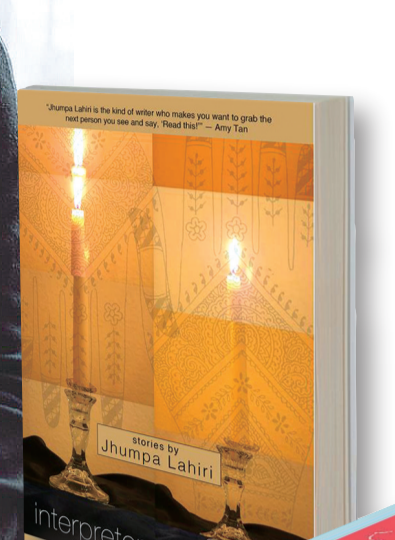
裴帕·拉希莉《解说疾病的人》： 和“遥远印度”的想象性对话

□俞耕耘

裴帕·拉希莉这位美国当代女作家,是最年轻的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,更重要的是,她是靠处女作摘得该奖。很多人并不在意这种“信息”,认为它不过就是腰封的宣传语言。然而,从“最年轻”和“处女作”,我们至少能窥见两点:一是“祖师爷赏饭吃”的天赋,二是起点就是巅峰的水准。这类作家,大多有早熟的自然天成感,他们的写作倾向喷薄,并非缓慢精进;他们往往直觉敏锐、情感深阻莫测、观察老辣柔腻。在我看来,这可称为“作家型人格”,后天修炼的只是技艺,却学不来人格。萨冈、杜拉斯如此,张爱玲也是如此。

一个作家要善于洞悉自己的控制力——到底是擅长长篇扛鼎,还是靠短篇取胜,就如歌手对他最好的首城抱有自信。拉希莉的获奖履历说明,她天生就是“短篇圣手”,包揽了欧·亨利短篇小说奖、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、《纽约客》杂志年度最佳处女作、美国笔会/海明威文学奖最佳虚构处女作等奖项,可谓“短篇大满冠”作家。处女作《解说疾病的人》就是一部短篇小说集,它充分展现了作家创作的风姿和特质。如果概括而言,就是透过私情和异域,书写诱惑与隔阂。

拉希莉的父母来自印度,移居美国,属于典型的第二代移民。就像大批美国犹太裔移民作家一样,他们总在文化、身份和价值的板块裂缝中生存。一方面,是“本土化”背后的“美国梦”、“移民梦”,迫切渴望成功,获得认同,创立家业,安身立命。另一面,是文化基因潜藏的“异质性”,它来自



《解说疾病的人》中英文版



“迁出地”若有若无、模棱两可的父辈记忆和族群归属。这在拉希莉笔下尤为鲜明,她的故事大多是美国和一个“遥远印度”的想象性对话。

拉希莉觉得,“印度文化于我是相当远的,尽管我在小说里努力写了许多印度文化的东西。我从来没有在印度长期生活过,从本质上来说,我和印度是相当分离的。我和印度文化的所有维系只是定期的访问,以及从小接受的家庭、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坚持不懈地保持着印度传统的生活习惯”。小说里的二代移民与作家情形高度契合。他们对印度的理解停留在符号之上,缺乏“原生性认知”,仅有一种“二手”经验:父母的讲述、家族的消息、日常的习俗、返乡的旅游。印度对于作家而言完全是陌生的他者,是充满诱惑的“异域”、一种“遥远的目光”。这是《解说疾病的人》所收故事共有的语境基调。

只不过,作家把这种类似“东方学”的后殖民

意识,完全隐匿在家庭的日常和男女的私情之中。这就有了隐喻的“层次感”和“互文性”。一种是生在印度、迁移到美国的父辈们遭遇到的失落隔阂;一种是生在美国、长在美国、接受西方教育的二代移民,他们被“异域的影子”诱惑,充满了探索欲。这是美国和印度在文化层面的诱惑与隔阂。在微观上,故事又展现了家庭生活以及男女情欲上的孤独和互不理解。在我看来,拉希莉最优秀的地方,在于写尽人物尝试理解时的愁怨、困惑和倦怠。那种质感就像指甲抓挠墙皮时的痛苦摩擦,艰涩、煎熬。

某种意义上,拉希莉的创作围绕一个“转译”的主题。不仅文化、语言需要转译,私人情感更需要,因为它是维系亲密生活的基础。然而,所有忧伤故事都源于转译的无力、无解和谬误。

她自言,“集子里收的许多小说试图道出为了交流沟通,人们所付出的努力,以及这些努力的徒劳、困惑与艰难”,“即便是父母和孩子,丈夫和妻子”……同名短篇《解说疾病的人》表面看就是一对美国小两口带着孩子回印度探亲加旅游的故事。旅行中导游的讲解、游客的攀谈,再稀松平常不过。然而,拉希莉却从百无聊赖的尘埃里捕捉“一闪而过的情感”,它微妙、变化、无以名状。在慵倦倦怠的生活里原来一直就潜藏着能量的压抑和对秩序(表面平静生活惯性的)的狂乱颠覆。达斯先生和太太米娜带着孩子去太阳神庙游览,开车接送的是兼职导游卡帕西先生。卡帕西提供了一种观察的视角和评价目光。在他看来,“这一家看着像印度人,却是外国人打扮,孩子们穿着色调鲜艳的紧身衣服,戴着半透明帽舌的太阳帽”。而达斯夫妇三十岁不到,缺乏为人父母的素养,就像是“大号的孩子们”。“他们简直就像一群兄弟姐妹”,“似乎也就这么一天他们需要管管孩子,很难相信他们能为任何人负起长久的责任来。”

作家不经意就透露出一种优越感,那种不知从哪儿随身自带的“西方自信”。“我和米娜都是美国出生”,达斯先生朗声回答,忽然透出一股自信,“那里生,那里养。我父母回来了,就住在这儿。他们退了休。我们隔两年就回来看看”,“这种描写是富于暗示的——他们已不是移民,他们是美国‘土著’,长着印度面孔的美国人。从而,整个故事充满了毛姆那种“南太平洋故事”的韵味。

对于不同文化和作家之间的碰撞,余华用树木和阳光作比,“一个作家受到别的作家的影响,就好比是树木接受阳光的影响。重要的是什么?树木在接受阳光影响时,它是以树木的方式成长,而不是以阳光的方式成长。所有有益的影响,只会让这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,而不会像别人。”李洱认为,总体而言,东西方作家在写作中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,没有很大差别。有感性的、通过激烈矛盾冲突去描写广阔社会生活的;也有注重思维方式的变化,从理性和智性上分析社会矛盾的写作,差别只在于作家要用适合自己的风格去表现。

欧阳江河坚持一种开放性的、有活力的诗歌创作,希望把诗歌创作与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、文化可能性、人类命运、语言实验等种种变化相联系。他认为,诗歌面对的挑战和可能性更多来自于诗人自己的写作,而不仅仅是面对世界文学的不同风景和语境。但这样的诗歌创作在追求广泛的阅读和读者方面,就会有所减损。这不是东西方的问题,而是个人写作和世界文学的对话关系所构成的一种挑战和选择。(世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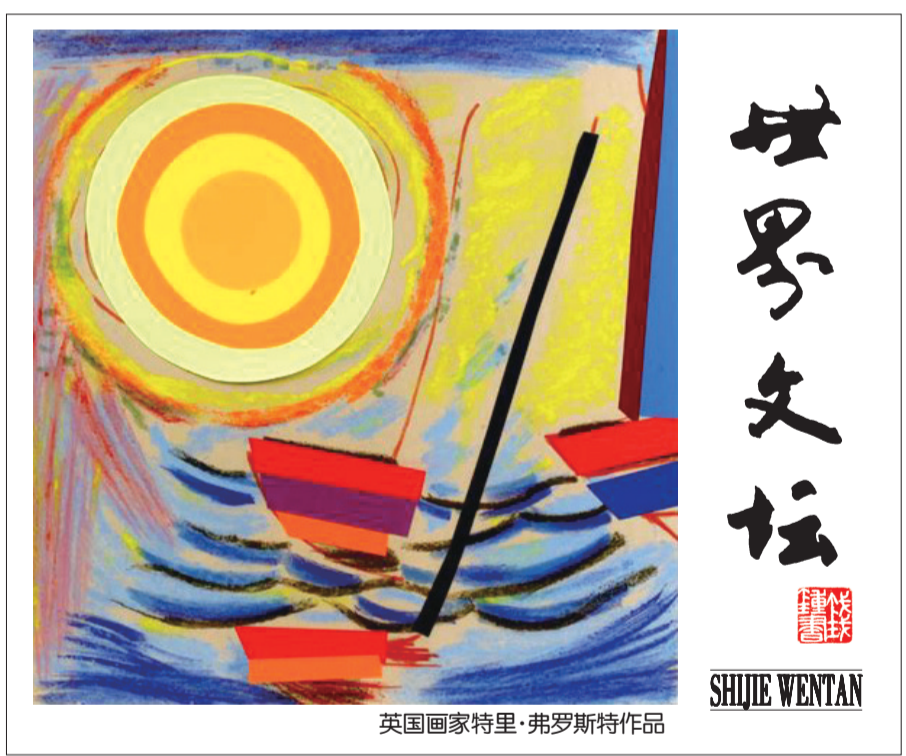
■ 动态 通向世界文学之路:东西方的不同视角 中瑞作家共话文学

近日,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、以“通向世界文学之路:东西方的不同视角”为主题的中国、瑞典作家对话活动在京举行。瑞典文学院终身院士、作家谢尔·埃斯普马克和中国作家贾平凹、余华、李洱、西川、欧阳江河以及瑞典文学翻译家陈迈平,从东西方两个不同视角探讨了世界文学视角下的文学创作。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丽在活动中致辞,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主持对话活动。

谈到文学的国际性,埃斯普马克表示,有些权威机构经常将文学分为外国文学和本土文学,经常会排斥外来文学而偏向本土文学,这是对于文学本质的一种误解。他说,优秀的文学往往是在外来影响和本土文学的汇合中创造出来的,最好的例子就是莫言。“我们经常提到莫言受到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和威廉·福克纳的影响,但如果只谈外来影响,那就是一种误解。他们教会莫言如何利用本土的材料,混合传统、神话的创作方式,他们只是给莫言一种启发启示。”埃斯普马克认为,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

是,可以创造一个概括性的、属于自己的土地和世界,也就是作家自己的“约克那帕塔法体系”,将高密东北乡作为世界的象征。所谓外来影响不是外国文学外国作家教本土作家怎么写,不是对作家的控制,而是展示一种方法,作家由此要寻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。

贾平凹也从民族、视角、继承等方面谈到作家要建立全球视野,为自己的写作建立坐标,这样在面对现实生活时会有新的认识、新的观察和新的线索。他认为,建立全球视野,需要学习和借鉴外来经验,民族的文学传统就像是河床,当外来的河水流过时,也会悄无声息地慢慢改变河床。作家要能够以另一种视角来看待中国,同时也能够立足于内部看向世界。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知识谱系和写作来源,无论是外来的还是中国的,作家要尽量全面和整体地接触各个时期的各个流派;对于传统,要尽量追远,而不是停留在皮毛。西川也谈到,在当下中国保持自己文化的生机勃勃,要求作家有广阔视野,除了经典,还要有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生活和正在发生的



英国画家特里·弗罗斯特作品

世界文坛

SHIJI WENTAN

Advertisement for '石油文学' (Oil Literature) magazine,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articles.

Advertisement for '诗潮' (Poetry Tides) magazine,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articles.

Advertisement for '解放军文艺' (Liberation Army Arts) magazine,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articles.

Advertisement for '长城' (Great Wall) magazine,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articles.